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双循环发展观

林毅夫* 王晓兵

摘要：本文详细介绍了中国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并从新的结构经济学方法的角度考察了它的理论基础。提出双循环的目的是将发展的重点从外部循环转移到国内循环，以此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本文认为，推动这一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促进产业升级的质的飞跃，实现更高质量的国内循环和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本文从中国决策者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的发展思想，也对其他国家面临的增长和发展问题有所启发。

关键词：双循环；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

英文原文：

Lin, Justin Yifu., and Xiaobing Wang (2021): "Dual Circulation: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View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DOI: 10.1080/14765284.2021.1929793

*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电子邮件：justinlin@nsd.pku.edu.cn；王晓兵，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电子邮件：Xiaobing.Wang@manchester.ac.uk.

1. 引言

自 1978 年以来，经过 40 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从一个孤立的经济体转变为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由高储蓄、高投资和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年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利于增长的政治制度所推动的良性国内循环，以及由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和进口推动的强大国际循环，引致了中国的非凡增长。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 40 年里，中国使 8 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做出了 70% 以上的贡献。到 2020 年底，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极端贫困¹，同时，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7% 提高到 17% 左右²。

在 30 多年以每年近 10% 的速度增长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 2012 年之后已经放缓到每年 7% 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标志着“新常态”时代的开始。由于许多国内和国际问题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长期存在，许多决策者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来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内外的挑战，中国政府在 2020 年采取了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际经济循环为辅、外循环促进和补充内循环的双循环发展范式。就如“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国际发展和合作战略³，采用双循环发展模式是为了应对中国面临的新现实和新挑战⁴。

国民收入核算可以简单分解为两部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活动可视为国内循环，进出口经济活动可视为对外循环⁵。双循环是对一个有对外贸易的国家经济运行模式的客观描述。强调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是突出以国内循环为主要发展动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目的是说明在面对稀缺资源或限制性的外部经济政策时，就自力更生和贸易依赖而言，国家优先点在哪里，由此为各级政府、企业和外国机构在作出经济决策时提供一个参考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出口对商品的数量和价格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体量很大，不能主要依靠对外循环，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由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将重点从国际贸易转向国内消费和投资是不可避免的一步。双循环发展格局即是对外部贸易环境短期变化的一种回应，也反映了长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中国政府正是在双循环范式的背景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培育更有效的国内市场，释放国家更高质量增长的潜力。

本文的目的是：1) 对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后的经济原理进行通俗易懂

¹ 中国官方用于定义绝对贫困的贫困线是按 2010 年的价格计算的每人每年 2300 元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每人每天 2.3 美元，比世界银行 2015 年确定的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国际绝对贫困线高出约 20%。

² 除非特别说明，中国的所有统计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NBS, 各年份)，世界的所有统计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用于比较的汇率是特定年份的平均市场汇率。

³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各次区域的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核心作用的同时，“一带一路”还包括政策对话、贸易畅通、金融支持和人员交流 (见 Huang, 2016)。

⁴ 双循环是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初的讲话中提出，并在 2020 年 10 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被确认。

⁵ 对经济循环的更全面理解还应考虑国际金融，如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活动。

的分析；2) 解释中国为什么要采用双循环作为发展新格局，从而为那些想了解中国发展思路的人提供参考；3)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发展思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要论述从双循环的角度看待经济的思想渊源；第三节论述新的结构经济学发展观以及国家如何发挥作用促进有益的结构转型；第四节论述了国际贸易的演变发展过程中的贸易模式；第五节重点介绍中国贸易模式的演变；第六节解释了国内循环在中国日益重要的意义，并讨论了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和确保高质量增长方面的作用；第七节总结并讨论了政策含义。

2. 关于经济循环的思想

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居民收入水平取决于它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宏观经济可以看作是一个循环系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在一个连续的正反馈循环中逐渐积累，以满足消费。这些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等。这种正反馈循环中的经济活动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产值来衡量，GDP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能力的重要指标。高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通常意味着高水平的平均生活水平、教育、预期寿命和福利水平。

亚当·斯密(1776)在他的《国富论》中指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流通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他之前，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因此贸易无关紧要，而重商主义则认为只有外贸顺差才能创造财富，因此国内循环并不那么重要。亚当·斯密批评重农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强调所有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强调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生产工人数量的增加。前者要靠加强分工，后者要靠增加资本。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都是技术进步的动力。斯密的“剩余产品出路”(Vent for Surplus)学说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生产量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时，就会产生一个过剩，这就会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内向流动。国际贸易可以用来消除这种盈余，并使生产能力恢复到最大限度⁶。因此他认为，资本积累是扩大生产、增加财富的重要条件。在他看来，由于资本积累取决于社会总资产分配到资本和消费中的比例，又由于节俭增加资本，而过度消费减少资本，所以他主张资本积累反对铺张浪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流通和循环进行了广泛的论述。《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副标题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分为三个部分：1) 资本的变形及其循环；2) 资本的周转；3)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它考察了资本流动的过程，研究了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除了直接生产过程外，还增加了交换过程。分析了个人资本的再生产(资本的流通和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过程。这些分析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补充和拓展，它表明资本不仅是一种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且是一个不断流动(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增殖。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

⁶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剩余产品出路”方法“实际上是重商主义的遗物，根据这一理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出售或以货换钱是(没有矿产的国家)致富的唯一途径……”。

也将国民经济活动视为收入的循环流动。与亚当·斯密不同，凯恩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受到总需求的强烈影响，总需求不一定等于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尽管节俭可以允许资本在微观层面上积累，但它可能会减少宏观经济层面的需求，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均衡产出降低。因此，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市场经济发挥其生产潜力。许多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和保罗·萨缪尔森进一步发展和形式化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使之成为新古典综合的一部分。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收入的循环流动理论得到进一步普及。

由于国民收入是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创造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简化版本可以说明如下。假设总产出由商品市场的均衡决定，均衡条件是生产等于需求，国民收入 (Y) 等于家庭支出 (C) 加上商业投资 (I) 加上政府支出 (G) 加上出口 (X) 减去进口 (M)。数学上可以表示为 $Y=C+I+G+(X-M)$ 。

消费是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从食品到音乐会门票，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组成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是企业购买新机器，居民购买住房等。政府支出是各级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如果一个经济体是封闭的，不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那么出口和进口都是零。国民总收入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总和： $Y=C+I+G$ 。

出口是将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出售给外国，进口是国内消费者、企业和政府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 ($X-M$) 称为净出口或贸易差额。如果出口超过进口，该国就会出现贸易顺差；如果出口低于进口，该国就会出现贸易逆差。对外循环的目的最终不是为了积累剩余，而是为了能够享受更多种类的外国商品和服务（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

1949年，威廉·菲利普斯根据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原理建立了“货币国民收入模拟计算机” (MONIAC)，显示了收入的循环流动。在机器中，不同水箱中的彩色水代表家庭、公司、政府以及经济的进出口部门。系统周围的抽水量衡量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因此，它可以模拟利率和贸易平衡的变化，从而进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的实验。MONIAC 建于现代计算机时代之前，主要用于教学。这台机器被设计成可以解九个联立方程组来模拟参数的变化。现代计算机可以非常精确地模拟这些关系。然而，由于经济要复杂得多，中央银行等机构使用的模型要复杂得多，但它们的可靠性仍受到许多挑战。

3. 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

3.1 经济是有结构的

在新古典主义模型的一个简单版本中，通常假设所有公司生产相同的商品（或几种商品），这些商品可供消费者消费、企业投资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这种简化使模型更容易处理诸如市场均衡条件等一系列问题，却无法区分与内外循环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实体经济的商品和服务种类繁多，许多实体经济与发展有关的问题往往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应该强调的是，所有经济体都是有结构的，不同的经济结构伴随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可以被描述为市场的复杂性和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正如 Hidalgo 等人 (2007 年) 所说，经济增长是通过提升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来实现的，而国家则是通过开发接近其目前生产

的产品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发展不仅是增长，而且是结构变化。

正是因为实体经济确实有结构，所以区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强调它们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关联，才显得重要。新结构经济学是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理论。它运用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运行在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论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软硬基础设施是内生于该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给定的禀赋，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理位置、现有的产业、金融、法律环境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Lin, 2012)。

新结构经济学方法认为，政府不仅可以通过提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来帮助经济提高生产能力，还可以通过刺激需求结构的变化来促进适当的结构变化。利用与全球前沿技术和产业的距离的后发优势，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仍有可能以每年 8% 以上的速度继续增长。政府应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帮助实体经济发挥潜力。

3.2 不同行业的双循环

经过 40 年的快速增长，中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到 2025 年很可能突破高收入经济体 12535 美元的门槛。随着收入的增加，中国人将越来越重视生活的质量，而不是停留在数量方面。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要么缩小技术差距，要么走向全球技术前沿。中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能越来越依赖自主创新，而不是技术转让。为了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一方面，国家在发展中必须遵循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将产生最大的盈余和最高的储蓄和投资激励 (Lin 和 Wang, 2017)。另一方面，它需要一个便利的政府在有效的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创新企业提供激励，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将经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中国将向世界市场开放经济，发挥比较优势的潜力，以竞争力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利用国内外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让中国人民共享世界繁荣，而且中国发展的利益和经验也将有助于其他国家。

收入增长取决于国内和国际循环的持续增长，而这又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拥有这些产业和适当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经济将更具竞争力，产生大量盈余，资本回报率更高，从而储蓄更多，确保禀赋结构快速升级，实现快速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 (Ju、Lin 和 Wang, 2015)。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具有后发优势，从而比高收入国家拥有更快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导致更快的增长和与高收入国家的融合。

产业政策是国家促进结构转型的有效工具。这是因为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所需的协调可能因行业和地点而异，而且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因此政府需要对其有效加以利用。然而，产业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就应该针对符合经济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潜在比较优势是指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产业，即与其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但由于软硬件基础设施不足，交易成本

过高，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还有待加强。

Hausmann 和 Rodrik (2003) 认为，在一个国家擅长生产什么的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因为很容易被仿效，发现国内成本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一旦政府帮助企业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方面克服协调和外部性问题，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中的企业将是可行的，这些行业将具有竞争力。Lin (2017) 根据与全球技术前沿的距离、创新周期的长短和与比较优势的符合程度，将中国这样的高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为五类，并根据各自的增长需求，建议政府因势利导。这五类产业分别是追赶型产业、国际领先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型产业、短创新周期型产业、国防安全和战略型产业。

对于追赶型产业，中国距离全球技术前沿还有距离。通常最快的追赶方式是购买更好的设备，与先进的外国公司合资，以及投资研发消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国家也应该自主研发实用技术，将引进的技术与本地的知识和技能相结合。这种国际循环一方面会减少中国企业进行重复性研究的需要，不必花费稀缺的资源重新发明，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外国企业持有的技术的回报。

这种国际技术交流有时会因地缘政治原因引起的保护主义而中断。例如，当美国加大压力限制中国的微芯片进口和获得其他技术时，中国政府应将这些产品和技术视为战略性的，并加强其产业政策，鼓励国内企业进行研究和开发，以允许开发进口替代技术。也就是说，虽然增加国际循环可能是互利的，但有时因为由于地缘政治原因，有必要提高某些领域的国内循环。

对于中国已经处于全球前沿的国际领先型产业，除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外，政府还应该支持企业进行研发，帮助企业减少在国际市场上的壁垒。这种国际循环的加强不仅意味着将中国商品和服务销往国外，而且意味着建立国际研发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开设子公司。这不仅有助于保持技术的全球前沿性，而且有助于技术外溢到国际社会，有助于中国履行对国际社会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义务。

对于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比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政府应该帮助企业转向回报率高的品牌、产品设计和营销管理；或者帮助企业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这种国际循环将有助于比中国更穷的国家利用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高其生活水平。

对于新技术引发的轻资产短周期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中国应投入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利用自身巨大的国内市场加速国内循环。企业应根据各地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创新。政府应设立孵化园，鼓励风险投资，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

对于国防工业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它们往往与一国的比较优势不相适应，通常具有资本密集度高、研发周期长、经济规模大的特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提供补贴和保护，否则这类行业的公司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将无法生存。这些无视比较优势的战略型产业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国家需要在国内拥有它们。由于这些产业对国际政治环境敏感，经常面临国际禁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国内循环是最重要的。政府应在包括研发投资在内的各个

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确保不存在受到外国制裁的瓶颈技术。

4. 外部循环

4.1. 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

先简要回顾国际贸易模式的演变和贸易理论中的主要论点。从广义上讲，全球贸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贸易。如果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能够比其他企业或国家更有效率地生产某种产品，它就具有绝对优势。亚当·斯密（1776）在他的《关于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调查》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并根据其绝对优势进行专门化生产，各个国家将同时获益。绝对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在所有商品中拥有更有效生产手段的企业或国家无法通过与效率较低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而获益。然而，李嘉图（1817）提出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只要贸易伙伴在机会成本方面具有不同的相对效率，贸易就有可能互利的。在李嘉图框架下，由于各国的技术不同，一个在所有活动中都比另一个国家更有效率的国家，只要相对要素价格不同，就会从贸易中受益。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假设每个国家都能获得相同的技术，并且不比另一个国家效率更高或更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自然禀赋决定了它们的贸易方向和从事的活动。各国将出口利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利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

工业革命后，纺织品、茶叶、瓷器等属于不同行业的产业间贸易主导了国际贸易。国家出口本国资源丰富的产品，进口使用稀缺资源较多的产品。李嘉图模型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基于劳动生产率或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为主要驱动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提高。正如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年）和克鲁格曼（1979年）所描述的，这是人们对更多种类商品的需求和公司规模收益不断增加的结果。克鲁格曼（1979）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表明，即使是两个生产力和禀赋相同的国家，也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因为规模报酬率不断增加。因此，两国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因为贸易使更深入的分工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有可能利用产业政策干预市场，在某些行业建立产业基础，从而使这些行业蓬勃发展。克鲁格曼后来在他的新经济地理学方法中扩展了这一点，他强调网络效应和集聚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产业集中可以刺激收益递增的相互作用，同时降低贸易成本。

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快速融合和关税的降低，带来了运输、通信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这为企业提供了将生产过程分割开来的机会，这使得零部件，而不是最终产品，能够根据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的国家生产。通过在产业间贸易中将零部件视为单个商品，这使得企业能够利用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技术和人力资本优势。全球价值链贸易量不断增加，目前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这种分工降低成本的方式类似于以前的行业间贸易，但它是针对零部件，而不是针对完整的成品。一方面，这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会，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大大增加了生产依赖性，使一些企业和国家更容易受到国际贸易摩

擦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贸易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不同的类别，但我们将把讨论局限于一种特定的形式：无工厂的商品生产商 (FGP)。这种生产商把所有的传统上都被认为是制造业的生产步骤，例如实际的物理、化学或机械的投入转化为新的产出的部分都外包给其他国家，而该厂商只承担创新步骤，安排必要的比如研发一类的投入，并做商品的营销，以取得良好的业绩。这些跨国公司拥有最终制成品的知识产权，如设计权和品牌权，一般占其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的附加值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如果没有工厂的美国跨国公司雇用位于美国境外的合同制造商生产其产品，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这些产品，这些“美国产品”就不算“美国出口”，因为它们不是从美国出口的，而是从中国等外国制造和/或组装这些产品的地方出口的 (Xing, 2020)。在计算贸易平衡和对外循环时，应考虑到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特别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增加，无论是从贸易价值还是从其面临的风险来看。

4.2 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贸易与 GDP 之比经常被用作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对外依存度的指标，但贸易与 GDP 的价值并不是严格可比的，因为贸易是按总值计算的，GDP 通常是按增加值计算的。在简化的国民收入公式中，所有出口货物的增加值都是国内生产的，因此无论净出口 (X-M) 是增加值还是总值，它们都是相同的。

然而，在实体经济中，不同的出口商品具有不同的附加值构成，因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和中间产品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经济学家对不同的事物使用总价值和增加值。例如，虽然增值税 (VAT) 是以增加值为基础的，但出口关税通常是以总价值为基础计算的。然而，总价值和增加值使用的这种不一致性常常导致政策辩论中的混乱。关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争论经常很激烈。Xing and Deret (2010) 指出，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往往夸大了为创造出口而进口许多中间投入品的国家的出口，这大大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实际双边贸易不平衡。例如，中国对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大量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是从许多国家进口的、获得许可的无形技术，这就扩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如果采用增值法，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显著降低 (Fu 和 Ghauri, 2020 年)。

经合组织 (OECD) 最近的一项估计显示，中国出口总值的 17% 来自外国 (Xing, 2020)。Johnson 和 Noguera (2012) 估计了双边贸易的附加值含量，并表明以附加值衡量，2004 年美中贸易失衡将减少 30-40%。Xing (2020) 认为，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评估双边贸易平衡应使用增加值，而不是出口总值。

因此，2019 年，中国出口占 GDP 的 17% 不应被解释为出口占中国 GDP 的 17%，因为一些出口增加值不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苹果每年销售约 2 亿部手机，几乎所有手机都在中国组装。然而，所有的核心组件、芯片、操作系统、设计和生产安排都是在美国完成的。正如清楚地印在 iPhone 背面的那行字所表明的“由苹果在加利福尼亚设计，在中国组装”。中国组装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部件，但当手机出口到美国时，所有的总值而不是附加值都算作中国的出口。当然，虽然 2009 年 iPhone 3G 在中国 iPhone 增值中所占的份额低于 4%，但 2019 年 (Xing,

2020 年) iPhone X 的这一比例已增至 25%左右。iPhone 中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的增加反映了中国的产业升级。

4.3 出口与发展

外循环对国内经济的贡献不仅仅是从国外市场的销售中引进资金，还包括与这些进口有关的技术、技术外溢效应和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管理技能。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说，外循环将有助于刺激经济，启动发展进程。重要的不仅是出口量，还有出口结构。Hausmann 等人 (2007) 认为，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组合可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收入水平”的指数，记录了它的属性，并表明全球化的收益取决于各国在这一质量范围内适当定位自己的能力。

有鉴于此，我们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提出了两个简单的命题：1) 当发展水平用图表表示在水平的 x 轴上，贸易与 GDP 之比用图表表示在垂直的 y 轴上时，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与发展水平的关系一般呈倒 U 型。在发展初期，经济主要是自给农业，对外贸易相对较少，相对封闭，贸易与 GDP 之比较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可贸易制造业商品所占比重增加，贸易与 GDP 之比上升。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时，经济将由服务业主导，其中许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国内循环增长更快，随着经济对外部循环的依赖程度降低，贸易与 GDP 的比率下降，贸易与 GDP 之比又开始下降。这种驼峰形的贸易与 GDP 之比有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得到缓解或放大。例如，为了启动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无视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减少对外循环；或者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促进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增加外循环。

2) 经济规模越大，贸易与 GDP 的比率就越低。一般来说，经济体越大，国内市场越大，国内消化生产产品的能力就越强，GDP 对国内循环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许多现代工业的规模回报率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小型经济体必须依靠出口来利用这一点，而大型经济体则能够在国内消费其大部分产出。许多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云计算、5G、数字服务和创意产业，都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规模收益递增形式，即初始成本巨大，但复制的边际成本非常低，甚至为零。第二，服务业产出的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贸易的。随着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出口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会降低⁷。第三，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特别是无工厂的生产商的商品贸易中，发达大型经济体的许多增加值没有计入出口值，因此也可能导致美国等国家出口与 GDP 的比率降低。

因此，对于一个大经济体来说，国内循环应该是增长的动力。例如，在美国，国内消费约占 GDP 的 85%，贸易与 GDP 之比仅为 20%左右。这是典型的国内循环经济，消费带动生产，生产创造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反过来带动消费。因此，当一个经济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时，外需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将趋于下降，发展模式将更多地向国内循环发展。

⁷ 然而，随着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成本的降低，服务业部门的很重要一部分可能会出现可交易的趋势。

5. 中国的外部循环

5.1 中国对外循环的演变

1978 年以前，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和农产品，进口主要是机械等资本密集型商品。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许多跨国公司将生产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中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即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生产或组装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材料和零部件，并将最终产品销往国外。

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升级以及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工资将趋于上升，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逐渐减弱 (Lewis, 1954 和 Villamil 等, 2020)。由于结构变化，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比重将下降。对中国而言，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商品已明显从服装、纺织品、鞋类和玩具，向电机、办公设备和电信业转移。虽然加工贸易一直是高技术出口的主要形式，但中国出口的复杂程度明显提高。随着中国的不断增长和技术升级，中国出口结构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相似性也在增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先是上升，达到顶峰，然后下降到中等水平。1980 年，对外循环微不足道，贸易与 GDP 之比仅为 12.4%，在所有主要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2006 年，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比 1980 年增加了 5 倍，达到 65% 左右。此后，对外循环状况大幅下降，2019 年下降到 33% 左右，出口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35% 下降到 2019 年的 17%。

2006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2100 美元，经济总量仅占世界 GDP 的 5.3%。当时，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 41.8%。到 2019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 10,261 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 16.4%。2019 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增至 54% 左右。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于许多服务业产出不可贸易，随着服务业的增加，出口占 GDP 的比重逐渐下降。

总之，对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上述一般原则。国内市场越大，生产的产品在国内的消化能力越强，GDP 就越依赖国内循环。新时期，随着出口对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弱，中国政府强调，中国要突出以内部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外循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新发展格局。

5.2 某些领域外部环境的恶化

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中强调国内循环是上述经济原则的结果，也是最近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结果。当前的世界秩序，特别是其贸易规则，最初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经常用这些规则来制裁不符合美国或西方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商业实体。这不仅表现为在其他国家设立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还表现为用美国法律的长臂管辖来制裁特定国家，阻断特定的商业往来。一个例子是利用《反海外腐败法》(FCPA) 的无限范围来

削弱可能的外国竞争对手（例如，参见 Pierucci, 2019）⁸。有人认为，美国利用国内法律制裁外国公司，利用硬实力为外国公司的利益分割全球市场，严重阻碍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比较优势。

财富的集中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了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不稳定（Piketty, 2014）和民粹主义抬头。为了转移注意力，一些国家政府将本国国内诸如就业机会不足、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例如，在过去四年中，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或贸易集团发起许多贸易争端和制裁。责备别人总是比解决自己的问题容易，但这意味着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

美国最近的干预严重阻碍了全球价值链，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当前的全球贸易秩序和世贸组织规则的信念。许多人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经济霸权，而不是出于他们声称的安全原因。“美国优先”的思想是其退出国际条约和不尊重许多全球协定的背后原因。让我们以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的制裁为例⁹。尽管美国禁止在其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但华为仍然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并在 5G 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自 2018 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了管控，向其他国家施压，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产品。尽管许多国家因此宣布了各种限制，但由于华为的技术既先进又具有成本效益，华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的销售额仍在增长。不仅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在手机等一些消费品市场也处于领先地位。2020 年第一季度，华为手机销量排名全球第一，超过三星和苹果。很快，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¹⁰，美国政府禁止华为手机使用谷歌的核心应用系统（谷歌移动服务，GMS）。虽然安卓操作系统是开源的而不受限制，但是很多核心应用程序，比如流行的地图、搜索引擎等都不能再下载了。因此，华为在许多国家的手机销量大幅下滑，导致华为手机销量在 2020 年底跌至第四位。华为被迫增加投资，加快发展自己的鸿蒙操作系统和华为移动服务（HMS）。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华为仍然能够在不依赖谷歌移动服务的中国市场销售其手机。

看到受到了严厉制裁之后的华为仍在增长，美国政府宣布了另一项打击，即从 2020 年 9 月 15 日起，任何使用“任何”美国技术的公司都不得向华为供应任何用于生产 5G 设备和手机的组件。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几乎没有不包含美国技术的组件。虽然华为自己设计手机芯片，但他们还是用其他厂商来制造芯片，而世界上只有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和三星有能力生产最先进的华为手机所用的 5 纳米芯片。华为的许多国际供应商因不能向华为供货而损失了收入，但这些公司却没有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合作，美国政府也会制裁他们。

⁸ 这项联邦法律的主要目的是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为其商业利益谋利。它涵盖了腐败行为发生时在美国的外国自然人和法人，但对这一法律的多种解释使得《反海外腐败法》成为影响最深远宽泛的法律。

⁹ 有许多毫无根据的指控，其中之一是指控华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因为其创始人是一名前军人。如果这也可以成为借口，韩国和以色列等拥有义务兵役的国家的人都可能被指控与军事有关。

¹⁰ 实体名单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公布的贸易黑名单，由某些外国人、实体或政府组成。该清单所列实体出口或转让特定技术需遵守美国许可证要求。

改革时期的中国已深深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没有为这种极端形式的制裁做好充分准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进口国，芯片进口额高于石油进口总额。由于依赖全球价值链，中国芯片制造技术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现在，华为很大一部分业务被迫退出外部循环，依靠国内循环。尽管可能需要很多年（估计需要3-5年）才能结出果实，但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正大力投资于完全摆脱美国技术的芯片制造系统。

从短期来看，这种独立自主的内循环生产投资模式可能面临困境，但从长远来看，许多中国企业将其视为一个机遇。部分原因是，美国制裁导致的国际产品供应链条断裂激发了人们对产品供应链安全重要性的认识¹¹。更多的重点企业开始在不使用美国技术的情况下追求自力更生。而中国消费者现在更愿意尝试国内供应商，这些厂商也因此获得更多机会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技术。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合作解决关键问题，投资或支持合作伙伴开展研发，生产进口替代零部件，提升整体创新能力。

如第3节所述，不同行业在国内和国际循环方面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各国应开放大部分产业，加强对外循环，利用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其好处是不仅能以较低的成本享受更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还能带来资本投资、技术和技能的注入 (Lin 和 Monga, 2017)。对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特定行业来说，仅需要少量的政策投入即可起到促进发展，达到令这些行业增长并拥有显性比较优势的目标。政策需要做的就是，向这些先行者们提供必要激励政策，助其扫清软硬基础设施中的障碍，降低其交易成本。成功的进口替代通常建立在成功的出口和内部研发能力之上。

然而，最近全球价值链的中断迫使华为等一些公司采取了一种通常只适用于国防工业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的做法。美国的做法就象生硬地强迫一个单纯只想喝杯牛奶的人，一定要去养一头牛一样的无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和华为这样的大公司来说，自力更生是可行的。但对于小经济体和小公司来说，完全靠自己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对国际共识的背离和违背，从长远来看，将损害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中国、印度和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多元化的世界经济秩序要求国际贸易规则也应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Rodrik, 2006)。为了世界人们的福祉，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

6. 国内循环的重要性

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模式，强调国内循环作为经济支柱的重要性，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出口和贸易不重要。中国将继续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向全球市场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进一步向外国公司开放中国的消费市场。

一些观察家认为对内循环的重视表明中国正在走向内向型和封闭型经济，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将继续利用内外部市场资源，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

¹¹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中的“危机”一词是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分别表示“危险”和“机遇”。这种解释在1959年和1960年肯尼迪总统竞选演说中使用后，在西方流行文化中得到了发展。

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虽然出口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评价中国正在从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变为试图淡化对外循环的重要性，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应当指出，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减少，而是由于作为该比率分母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不断增加。比如，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8万亿美元，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5%，接近1万亿美元。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4.3万亿美元，17%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意味着中国出口了价值约2.5万亿美元的商品。这意味着2006年至2019年间，出口总额增加了1.5万亿美元（尽管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减半）。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口额从2006年的792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0770亿美元，净增12860亿美元，进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006年的28.8%下降到2019年的14.4%。

国内循环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量和服务业的规模，而这两者都是收入增长的内生因素。为了增加国内循环，中国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市场配置功能，发挥比较优势，发展中国经济，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必由之路。经过40年的经济转型，中国的产品市场已经基本放开，但对要素市场的许多干预仍然存在。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需要在金融服务部门、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以及所有制等领域采取更大胆的改革措施，减少市场扭曲，更好地释放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潜力，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和更广泛的行业准入机会（Lin, 2013）。收入分配领域也应进行改革，以减少不平等，促进区域一体化，让更多人享受发展带来的好处（Kakwani等，2019年；Rangazas和Wang, 2019年；Wang, 2019年）。同时，政府应继续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Wang等，2019）。此外，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协调关系，令经济能够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中受益（Lin, 2012；Lin, 2017）。

尽管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制裁限制了它们的全球化战略，迫使它们进行更加独立的技术研发；但中国和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除了注重加强自身能力外，还应该继续拥抱全球化。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言，“如果你不拥抱全球化，就没有未来”。他认为，华为对美国没有什么怨恨，华为会继续把苹果等许多伟大的美国公司当作自己的老师和榜样。有人认为，苹果已经建立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苹果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公司都可以赚钱、可以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这是因为在苹果公司积累财富过程中，它不仅投入更多的研究和开发来制造消费者喜欢的产品，还提高了员工和供应商待遇，于是，每个公司都希望成为苹果供应链的一部分。

7. 结论

本文为“双循环”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又简明的理论基础，并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这种发展模式的底层逻辑。“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决策者和企业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在新时代发展道路的明确参考点。强调将国内循环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将有利于更好的抵御外部冲击。为了实现高质量增长，我国需要继续依靠外循环的力量，以此增进国内循环，同时依靠扩大国内循环加强对外循环。双循环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而是意味着进一步增强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1997年，中国政府确立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超过1万美元，还远低于美国约6万美元的水平。中国的优势在于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高增长潜力。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持续增长，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有赖于解决当前阶段所面临的诸如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扭曲和收入不平等许多深刻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将继续拥抱全球化，促进全球合作。在国内，中国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原则和国家目标。共同富裕是指通过艰苦奋斗和相互帮助，消除两极分化和贫困，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高生活水平。世界银行的“共享繁荣”的概念是对共同富裕的回应。在国际上，中国主张多元主义、不干涉主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建立在各国合作共赢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一带一路”旨在通过提供发展资金、无条件援助和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机会，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Wang等, 2014; Lin和Wang, 2017)。全球化的最佳形式是，每个国家和每个企业都在经济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享受消费品并达到更高的繁荣水平。

面对不确定世界的挑战，中国的关键是增强自身能力，管好自己的事务，开阔自己的视野，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个健康的国际竞争，应该是谁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好处，谁能为人类文明的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这种竞争不应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还应是建立和维护公平和协作的全球秩序。中国企业不仅要考虑行业竞争对手，还要注意外部环境的约束，帮助构建合适的经济生态系统。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时，所应该关注的不是通过降低劳动标准或补贴来获得垄断，而是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国内外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信任。

当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时，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从而能够保持一条更加稳定的发展道路。作为全球第二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实行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对全球经济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孙中山先生在1922年提出：“中国的自然资源是巨大的，适当的发展可以为全世界创造一个无限的市场。”中国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而且可以使贸易伙伴受益，扩大他们的市场，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参考文献

Dixit, Avinash K.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3): 297-308.

Fu, Xiaolan and Pervez Ghauri, 2020, “Trade in Intangibles and Global Trade Imbalance”, *The World Economy*, <https://doi.org/10.1111/twec.13038>.

- Hausmann, Ricardo., and Dani Rodrik,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2): 603-633.
- Hausmann, Ricardo, Jason Hwang, and Dani Rodrik, 2007,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1):1-25.
- Hidalgo, César A., Bailey Klinger, A-L Barabási, Ricardo Hausmann, 2007,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317 (5837): 482-487.
- Huang, Yiping 2016,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40: 314-321.
- Johnson, Robert. C. and Guillermo Noguera, 2012,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6 (2): 224-236.
- Ju, Jiandong, Justin Yifu Lin, and Yong Wang, 2015.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6: 244-263.
- Kakwani, Nanak., Shi Li, Xiaobing Wang, Shanshan Wu, 2019, “Social Tensions in a Growing China” *The Manchester School*, 87(2): 228-258.
- Keynes, J. M., 1935 [1964].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first Harbinger edition). New York, Chicago, Brulington: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Krugman, Paul.,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469-479.
- Lin, Justin Yifu., 2012.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Lin, Justin Yifu., 2013.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6 (30): 259-68.
- Lin, Justin Yifu, 2017.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5(1): 5-18.
- Lin, Justin Yifu and Celestin Monga., 2017. *Beating the Odds: Jump-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n, Justin Yifu., and Xiaobing Wang, 2017, “The Facilitating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Man and the Economy*, 4 (2):1-19. Reprinted in Lin and Nowak (edit), 2018, *New Structural Policy in an Open Market Economy*,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 Lin, Justin Yifu., and Yan Wang, 2017, *Going Beyond Ai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various years, *China Statistical Year 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Pierucci, Frédéric., 2019, *The American Trap: My Battle to Expose America's Secret Economic War Against the Rest of the World*, London: Hodder.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ngazas, Peter., and Xiaobing Wang, 2019, "Intern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 and Labor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64(2): 263-279.

Rodrik, Deniel. 2006. "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 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4(4), 973-987.

Ricardo, David. 1817. *On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21. Volume 1 in P. Sraffa, 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 H. Dobb,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53.

Smith, Adam,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illamil, Anne., Xiaobing Wang, and Yuxiang Zou, 2020,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ith Dual Labour Markets". *The Manchester School*. 88(6): 801-826.

Wang, Xiaobing., 2019, "Regulation and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7(1): 47-64.

Wang, Xiaobing., and Jenifer Piesse, 2013 "The Micro foundations of Dual Economy Models", *The Manchester School*. 81(1): 80–101.

Wang, Xiaobing., Adam Ozanne and Xin Hao, 2014, "The West's Aid Dilemma and the Chinese Solution?"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2(1): 47-61.

Wang, Xiaobing., Nick Weaver and Ning Xue, 2019, "Challenge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7(1): 1-7.

Xing, Yuqing., 2020,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missing exp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61: 101429.

Xing, Yuqing., and Neal Detert, 2010,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 Working Paper 257*,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